

籀园书系



籀园讲坛

下册

苏鲜女 邵余安 编

上海遠東出版社

籀园书系

籀园讲坛

下册

苏鲜女 邵余安 编

 上海遠東出版社

目录

天朝遥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周 宁	373
浙江文化史上的两个宝贝：郁达夫和徐志摩	韩石山	401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孙立群	418
可爱的王朝：两宋政治制度漫谈	袁腾飞	442
从边缘到中心：永嘉学派崛起的历史奥秘	王 宇	465
海派书画篆刻艺术漫话	韩天衡	493
音乐生活漫谈	吕 远	511
小品剧本创作与小说散文创作的区别	曲士飞	530
口语沟通，塑造听觉灵魂	林 毅	559
人像摄影	许喜占	579
了解日本，不当怨妇	陈希我	605
企业繁荣与道德教育	吴潜涛	624
明天你拿什么去竞争？	姚鸿昌	643
如何提升孩子的综合学习能力	郭瑞立	681
厌学辍学休学少年父母恳谈：“成长 110”中学生 成长护航	叶小平 萧 芸	715
做时间的经纪人	张立勇	750
让和谐与幸福充满家庭	金一虹	772
海外温州人的生存路线	王春光	801
编后记		823

天朝遥远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周 宁

主讲人简介



周宁，1961 年生于天津，1992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戏

剧系、美国伊利诺依大学(UIUC)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著有《比较戏剧学》《想象与权力：戏剧意识形态研究》《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世界是一座桥》等。

在讲座之前，我想先把我的最基本的意思告诉大家，我们这些年越来越关注所谓中国在海外的形象，或者说国家形象，我们有时候为这种形象好了感到高兴，不好了不高兴。但是，我们未必真能理解这些形象是缘何而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今天把三个问题说清楚。

第一，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未必都是真的。既然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他们说什么,我们也不必那么当真。比如说他们过去讲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人走起路来骨节“嘎嘎”直响,说中国人每天三餐要吃老鼠等等笑话,大家不必当真。冷战时候美国人流传着一个关于中国的说法,说全中国人民都在挖地道,地道怎么挖呢?从北部湾到渤海湾,中国人民开始挖地道,挖过太平洋,从美国圣地亚哥到西雅图一线西海岸就出来了,这能当真吗?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我有一年到洛杉矶去看一个朋友,到他们家刚坐下还没有十分钟,她的先生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过来跟我说,他昨天刚看到报道说中国有290枚导弹瞄准洛杉矶。我觉得这个事很荒唐,这个是在《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后来他拿着那个报纸给我看,是安排在骑缝上的一则消息。你说瞄准洛杉矶需要290枚导弹吗?所以,我们知道外国人有很大关于我们很离奇的看法与说法,我们未必要当真,也不能他一讲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很生气。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有诚意、有研究的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确实是很准确、客观、深入的,有时候比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入。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可能真要认真,因为这个时候西方反射出的中国形象可能是一面镜子,是一面可以让我们借镜自鉴的镜子,这时候我们是要认真的。所以,第一点我要说明的就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未必都是真的,所以大家不一定当真。

第二,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是摇摆不定,变幻莫测的。不仅不同人、不同社会阶层对中国的看法不一样,在不同时代对中国的看法也截然相反。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讲座可能会给大家集中讲述过去一百年左右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你会发现他们的看法大概每二十多年就一换,而且换的看法截然相反,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觉得很惊奇的。而且他们这种变换往往跟中国历史与现实本身的变化没有多大的关系,反倒是西方人自己的那种心态,他们的现实处境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就变了。我想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莫衷一是。不要说今天你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报

道说中国很糟糕,明天你可能就会看到他一则报道说中国很好,你也不能说我们只在我们的媒体里面对我们的人民说,美国人最近都在骂我们,或者美国人最近都在夸奖我们,实际上未必,他们说什么话的都有,而且那些说法经常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去年年底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按我们的想法,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形象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口袋里有钱。前一段时间,有人注意到美国人发明了一个词,就是把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名称的英文单词各取一段,中国取前面三个字母,美国取后面四个字母,合成 Chirica 这么一个词,表示“中美国”。我们同胞们很高兴,这下我们终于跟老美平起平坐了,而且美国人好像很重视我们。我自己看到的进一步的报道就觉得有意思,实际上美国人这样说未必就那么有善意。我看到讲 Chirica 的一篇文章旁边有一个漫画,这个漫画画着两个人,一个大肚子的中国人,一个很瘦的美国人,然后背靠背坐在那里,连体的,他说中国和美国如今是屁股连在一起的,但是脸却朝着不同的方向,想不同的事。然后下面的文章就更酸了,说这个世道真是变了,过去是富人给穷人借钱,现在是穷人给富人借钱。你就觉得他们有时候表面上对中国的说法是好意的,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就未必。我们其实不一定真了解西方人怎么看我们,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跟前面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此时此刻才产生的,而是决定于西方人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看法,这些看法已经积淀成一种文化心理背景,这决定着他们对今天中国的态度。比如说有人做研究,2008年中国开奥运会,这个2008年是很折腾人的一年,一开始中国发生雪灾,然后美国人说中国很糟糕,你看看他那个电线跟面条一样,下点雪它就断了,因为西方人一直说面条是中国人介绍给他们的。下面到了三月份火炬事件发生时,他们来劲了,都开始说中国坏话。然后最有意思的是 CNN 的主持人说中国人五十年来就是一帮歹徒和恶棍,说得很痛快,我们

政府出面抗议，你越抗议，他的收视率越高。后来是汶川大地震，然后 CNN 关于中国的报道瞬间都好了，我们舒了一口气。

下面就是奥运会，我们的想法是奥运会一定会让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很好，我们把奥运会办得多好，但是我注意到两点，一是中国金牌很多，美国人说中国办奥运会，你取得那么多金牌，就像你请朋友到你家吃饭，然后你把饭都吃了。美国那些报道是什么奇谈怪论都有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西方人说的话我们不必当真。二是我们很有排场的奥运会开幕式，美国人看完了以后也感想不同。比如说，我们没太注意的事情他就注意了，我们那时候奥运会开幕式上有一个中国鼓手，因为我没有看那个开幕式不知道，后来看国外的报纸才发现，他们说那个鼓手太可怕了，说中国人现在都是肌肉男，过去中国人都有病，按他们的想法都是抽大烟或者都有病，现在都成肌肉男了，他们说这个了不得，中国人很可怕，中国是威胁。

再比如说，他们看到我们开幕式阵脚特别整齐，做那个“汉字”的时候一下子起来了，一下子落下了，美国人说这个糟糕了，你看他把人训练得都跟机器一样，一起起来了，一起落下了。而且他们这个用心很歹毒，他们在拍我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插播一个片花，这个片花是朝鲜阅兵式，朝鲜阅兵式都是这样昂着头走路的，跟他们很像。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得很好的时候，洋人们不把我们当回事，他们的看法跟我们自己的看法相反。而这些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说的根据不是中国的现实状况，而是说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那种看法，他们素来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面对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了，然后向四周看看，你不认识他，你就会把他这个行为理解为一个纯粹的从外面走进来的行为。如果你认识他，你可能会从他过去的行为出发，对他此刻走进来的行为做一系列的解释。实际上西方对中国今天的看法，就是他认识这个人，他的任何一个行为都要从他过去已经掌握的知识与想象的背景去解释。我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西方人今天对中国的看法取决于他们历史中积淀

的那些旧偏见、旧傲慢。

所以说,要了解西方人今天对中国的看法,一定要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历史,因此我才讲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跟西方人交道打了七八百年了,我们不可能把七八百年的事情都讲清楚,今天我们时间很有限,我就讲一百年。从一个梦讲起,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把他的宫廷画师叫来了,说我做了个恶梦,我给你讲讲,你给我画出来。然后,这个宫廷画师就把他的恶梦画出来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做的那个梦的主题是关于中国人或者说黄种人,当时也包括日本人,是如何威胁欧洲的。这幅画的名字叫《黄祸》,下面有一行字叫“我们要保卫欧洲”,画面上是一个山崖,站在山崖上的长翅膀的这个人是大天使米盖尔,他象征德国,他后面站着七位天使,这七位天使分别象征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美国、俄罗斯,他回头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保卫欧洲。”然后他另一只手指向远方,远方是烟云缭绕,云端有个佛陀像,下面有密密麻麻的小人,还有几个佛陀,一看就知道指的是中国。一百年前,这些国家就是一个团体,一百年后,北约、七国会议等等还都是这些国家。实际上这个世界百年间没有多大变化,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差不多。

这幅画后来印了好多,德国皇帝拿去送人,比如说英国首相、法国总统、美国总统、俄国沙皇都送了。但是有意思的是,1898年,大家想想这一年,是我们戊戌变法的那年,那时候中国烂得一塌糊涂,怎么能威胁欧洲呢?所以说,这种恶梦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只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1898年马上到了第二个千禧年的尽头,叫千禧年世纪,这时候在欧洲或者基督教世界有一个普遍的恐慌,就是世界末日恐慌。因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关于时间的想象力是有限的,他们说这个世界只能存在一千年,从耶稣降生那年开始算起只能存在一千年,到了千年的尽头就会出现各种灾难,然后上帝就出来审判人,末日大审判时,这个现世就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第一个一千年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到了第二个一千年，西方人就有点慌，觉得总得发生点什么。他们这个时候关于“黄祸”的传说，可能跟他们当时的那种千禧年恐慌有关。为什么黄祸跟千禧年有关呢？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比如说，关于世界末日那种描述基本上是在《圣经启示录》里面，那里面关于世界末日的描述是这样的，说到了那个时候被锁在东方深坑里的撒旦，有许多语种把撒旦译成古蛇或者古龙，将挣脱锁链，号召魔鬼部落围攻上帝之城。

这里有几点让人感觉奇怪的，一是西方人潜意识里面的那种联想。比如说撒旦，西方人早就知道中国人的图腾是龙，而在他们的想象中龙是魔鬼，是恶兽撒旦，古希腊传说里面就有关于所谓东方恶龙的传说，古罗马又有所谓圣乔治屠龙的传说。再往下面是中世纪的那些欧洲的画家，那时候的画家都是画宗教画的，他们画什么，好画的比如说画耶稣，很好画，如果你是日尔曼人，你就画一个黄头发的、忧郁的、瘦削的日尔曼青年；如果你是高卢人，可能就把他画成灰头发；最麻烦的是画魔鬼，你把魔鬼画成什么样，人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画成狐狸、鳄鱼、蛇、蝙蝠，这些他们都画过，但是让人一看都不像，这不是鳄鱼吗，这不是狐狸吗，所以他们很苦恼。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开始到中国旅行，也就是已经中世纪晚期了，他们把中国的器物、图画带回欧洲，那时意大利锡耶纳文艺复兴已经开始了，那些画家们就明白了，很兴奋，说原来魔鬼就是中国的龙。所以，以后他们画魔鬼就经常画成中国的龙那个样子，这是第一个联想。

第二个联想是这样的，魔鬼是锁在东方的一个大坑里，然后魔鬼挣脱出锁链，号召地上的魔鬼部落，这个魔鬼部落是两个词，这两个词合起来可以让人们想到一个很奇怪的词，跟我们又有关系，是Mongolia——蒙古利亚。再加上他们把整个从西伯利亚到我国华北这个广阔的地区称为鞑靼地区，在拉丁语里面Tartars(鞑靼)这个词的意思是“地狱之地”。最后，众多的中国人口和亚洲黄色皮肤的人

口让他们想到像海沙一样的魔鬼部落。

如果仅仅做一个恶梦,有很多所谓的世界末日的恐慌,有一些集体无意识的联想还不能成为什么事。一年以后出了一件事,山东曹州府一个很穷的小村子里面,有几个流氓(流窜者)去偷东西,偷一个德国传教士家,当时的传教士是有枪的,他们在半夜潜伏进去的时候被传教士发现了,传教士就开枪了,打死或者打伤了其中一个,另外几个就火了,冲上去就把那个传教士给打死了。传教士被打死了以后,第二天电文就传到德国了,德国首相非常高兴,说我一直找借口要出兵中国,占领胶州湾,这下子有机会了。所以,德国人就出兵占领胶州湾。

德国一出兵,我们的朝廷就慌了,说你看这几个草民闯了大祸,偷什么人不行,怎么能偷了洋大人呢?说砍了吧,就把这几个草民给砍了,按理说中国历史上砍几个草民不算什么事,可是曹州这个地方是个很麻烦的地方。我如果告诉你们,谁跟这几个草民是同乡,你们就知道该多麻烦,第一个著名的同乡是黄巢,黄巢大起义差点把唐朝给搞没了,黄巢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还有一些同乡,像宋江、李逵、武松,都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中国古话说“翻却曹州天下反”,这个地方一闹起事来天下就反了。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容易闹事呢?因为这里的人日子不好过,这个地方是穷山恶水。

因为仅根据中国历史上的记载,曹州府黄河就改道八百次,这很可怕,今天日子过得好好的,到夏天七月份洪水一泛滥,你们家、一个村子就没了,河道突然新出了一片空地。民不聊生的时候民就不畏死。这事就闹大了,一是这个地方民不聊生,民不畏死;二是这个地方连续四年干旱,那些老百姓没事干,庄稼颗粒无收,就在村口聚集起来练拳,练一种叫金钟罩的拳,说练了这个拳以后,就像有一个金钟把自己罩住了,刀枪不入。这样又练拳,又民不聊生,又民不畏死,闹事的最基本因素不就出来了吗?然后就越闹越大。

下面的问题是京城里的太后又惊又慌,说这怎么回事,问她的部

下内阁大学士们说，你们说这帮老乡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中国的官很有意思，他首先想的不是说真话，而是上司想听什么话，他揣摩慈禧此刻想听到的是他们刀枪不入，所以我们这些内阁大学士，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就告诉慈禧说，他们真是刀枪不入，了不得。为什么慈禧想听这句话呢？因为慈禧一直很不喜欢京城里的那些洋人。有一个大学士给她上过一本书，说洋人在闽浙沿海，就是浙江、福建那边，就像您老脚上长了癣，只是痒一痒，离心脏很远；说如果他们跑到京城里，就像您这个腋下长个瘤，非把它除掉不可，要不会威胁到心脏。所以，慈禧一直想把北京城的洋人赶走。

但这时候她发现清兵没有用，清兵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败了，第三次中法战争又打败了，然后连倭寇都把我们打败了，中日海战也打败了，她知道军队没用，这时候人民厉害了。她就寄希望于这些人民，义和拳民能够进北京把洋人赶走，然后她宣义和拳进京，赐义和拳为义和团。所以我们都知道义和团大起义，然后一下二百万义和拳民就涌入北京了。干什么呢？围攻秀水街、西什库教堂那一带，围攻洋人，围攻了四十多天，还没把洋人的据点打下来。当时只有不到四百个洋人在北京，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不下来。

然后，八国联军来了，八国联军一来，我们的义和团民就瞬间蒸发了，所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太后很恼火，说你们这些人谎报军情，说有那么多义和团民怎么一个都不见了。她不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义和团进北京了，然后那些周围的农民没事干，就在头上绑个带子，身上勒个带子，义和团民就进北京了。说洋人来了，带子一卸又回家种地了，当然你找不到他了。但这个事算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西方人就想，怎么给自己下台阶，关于这个“黄祸”说怎么下台阶。因为当时对义和团的报道非常多，而且他们普遍认为义和团就是“黄祸”，这个报道多到什么程度？1900年年底，有个英国的被围的军人退役回了英国没事干，在家里给他的

朋友说,我想写本义和团的书,他的朋友说算了,别写了,这种书太多了,我们家就有43本。你看1900年那个时候的出版规模,在英国关于中国的一个事件有43本书,你们在座的谁家里有关于美国革命的43本书,英国革命的43本书,法国革命的43本书的?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影响有多大。

在西方,中国历史上有两大事件影响最大,一是义和团,二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再举个例子。1918年,有个美国长老会参会的传教士接到一个指令,说派他到中国传教,按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他接到这个指令的那天夜里,一夜都没睡觉,他是吓的。他说他马上想起来小时候读的一部书,叫《十字架与龙》,这部书就是描写义和团的,他非常害怕,他知道这一去就不能活着回来了。所以我们注意到,一是影响特别大,二是这种影响是恐怖的、负面的影响。

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搜集当时那些被围在北京的洋人不断地往西方传过去的报道、电文。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写法基本上都一样,都是那些面目不清的黄种人,呼天盖地地就来了,嚎叫着围攻他们这几个像孤岛、绿洲一样的所谓上帝之城,都是按照《圣经启示录》关于世界末日的那个景象去描述义和团的,所以这个事才特别恐怖。

当然,义和团事件过去了,过去了以后,西方人必须解释这个问题,要不人家说你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在讲鬼故事。于是就有两种关于“黄祸”的解释:第一种最典型的是,有一个美国人在一本叫《万岁帝国》的书的前言里面写到,“黄祸”并不是中国军事多么强大,经济多么强大,会入侵我们,占领我们的领土,挤兑我们的市场,不是这个意思。他说“黄祸”的意思是,有这么一个民族,他跟我们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如果他跟我们共处在地球上,我们怎么都感觉威胁和难受。他说,你想有四万万人占领着从交趾支那到西伯利亚的广阔土地,这些人面目不清,思想不明,终日穿着没有任何感觉的大棉鞋和

走不动路的大棉裤,谁也不知道他想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如果他们能够呆在自己的国家还算好,可是他们现在开始往世界范围内发展,那么我们的灾难就不远了。他说关于“黄祸”的意思就是,一是中国的差异性,跟他们完全相反;二是中国人的不可思议性,你不知道中国人脑子里想什么;三是中国人毫无个性,永远都是步调一致地做事,这样才危险。按他们所想,中国人就像那种只有一个头脑,有无数个身躯的怪物,他说这就是“黄祸”。

所以,夸大种族的差异性“黄祸”这种思想的根源。我们注意到一个优势民族看劣势民族的时候,它往往在强调差异,你跟我不一样;而一个劣势民族看优势民族的时候,往往强调同一性,我跟你一样。我们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洋人们喜欢的中国美女,都是中国人看着很丑的,我们问过洋人为什么这样呢?他们说,因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所以很漂亮,比如说脸很宽,鼻子很小,眼睛很细,而且往上翘着,有很高的颧骨,他说这样漂亮。后来我琢磨,为什么这样漂亮呢?就是跟他们都不一样,他们脸很窄,我们的脸很宽;他们的鼻子很高,我们的鼻子很矮;他们的眼睛很圆,眼线向下,我们的眼睛很细,眼线向上。他们拍我们的花木兰就画成这样,他们一直在强调跟我们的差异。

可是我们呢?强调的是同一。比如说,中国的美女什么样的漂亮呢?如果自己脸长宽了就磨掉一点,鼻子长低了要垫高一点,为什么这样?因为要像洋人。所以洋人始终带着那种优越的态度看待我们,强调那种差异性。比如说,最早到中国来的那批洋人,当时有一个法国的浪荡公子没什么事干,坐着远东的船到了广州,大概是一八一几年的事,那时候广州还没有开放,洋人们只在十三行里做生意,然后住在那,没事干就给法国报纸写文章,说中国人太奇怪了,什么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到广州一上岸就感到眩晕,问一个中国人吹的什么风,中国人说西北风,他说我明明感觉是东南风,说我们讲风的方向是讲风吹向的那个方向,中国人讲风的方向是风从哪里吹来

的那个方向，跟我们相反。他说，我们见了朋友就伸出手握朋友的手，中国人怪了，一见朋友他缩回手去握自己的手。他说我们有马甲，马甲是穿在衣服的里面，中国人的马甲是穿在衣服的外面。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我们看书是从左向右看，他说中国人有意思，从右向左看。所以，他说中国人什么都跟我们相反，强调差异。

第二个特征，强调中国人都一样。他说，当你看到中国人的时候你会感觉恐怖，因为所有人都长得一样。可是没有哪个中国人长得一样，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对我们的贬低。什么东西长得一样，动物才长得一样，一群羊过来了长得都一样，你能说这只羊和那只羊长得不一样，看不出来。因为人的面相是跟人的精神个性相关的，你没有任何精神，长得就一样了。

第三个特征，说中国人实际上是没有头脑的，说中国是一个怪物，只有一个脑袋，有无数双手，有无数双脚。你不要看每个人肩上都顶着一个脑袋，实际上那个脑袋根本没用，中国只有一个脑袋在紫禁城，而那个脑袋还有病。

这三点是他关于“黄祸”的解释，这是一种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很有意思，说是有一个在中国呆了四十年的英国人，叫赫德，当过中国海关税务司长，义和团事件之后那年年底，他说，不是没有“黄祸”，是“黄祸”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说，你试想五十年后二百万义和团民的后代用现代西方武器武装起来，接受德国式的训练，当这些人出现在你阵地对面的时候，“黄祸”的时代就真正到来了。这是他们关于义和团事件与“黄祸”的解释。

我们注意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年来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那个起点，最初的看法就是“黄祸”。西方人并不是一直对中国这样看的，很奇怪的是，大概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形象开始变好了，而且越来越好，到最后好得都令人难以置信了。从1900年到1925年中国社会并没有变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更混乱，他们对于中国的

印象或者看法的转变,跟中国本身的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个变好法呢?比如说,他们开始把中国想象成一个牧歌田园式的地方。1931年美国出了一本书,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后代叫赛珍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叫《大地》,写的大概是中国江苏那一带。因为她是在镇江长大的,她四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从美国来到镇江传教,后来回到美国读大学,写中国的乡村,写中国的农民是如何善良,如何勤勉,如何热爱土地,如何道德清廉,就是歌颂中国农民。一本写中国农民的书竟然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而且连续两年名列美国畅销书榜首。1937年,她的这本《大地》又被拍成电影,据当时统计,1938年那一年有8 000万人次看过这部电影。1938年的城市人口远没有今天这么大,8 000万人看过这部电影,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而这位赛珍珠小姐竟然因为一本写中国的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她是多么伟大的文学家,现在除了中国文学史,大家都不提她了,她的文学成就并不是很大,而是因为她写中国。所以,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印象。两年以后,英国又出了一本畅销书,叫做《消失的地平线》,这个畅销书作家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凶暴、腐败的,他要为这个世界写一个所谓的人间乐园,书的故事很有意思,是一个英国的军官在印度的一场骚乱中仓皇之间上了一架飞机,然后这架飞机开始起飞,在午夜时分飞机降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他一出机舱,就感觉清新极了,头顶是一轮弯月,整个山谷里面非常漂亮,田舍、农田都非常漂亮,他觉得自己来到了世外桃源,人间乐园。这是什么地方呢?是在中国西部,这个地方叫香格里拉,这个地方是他编的。我们讲了很多虚幻的事情,老以为虚幻跟现实无关,但是我要说明的道理是,决定我们的现实行为的经常不是理性,而是无意识。

比如说,一个畅销书作家编造的一个地方香格里拉,你今天可以在中国地图上找到了,它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地方,在滇北,过去叫中

甸，现在叫香格里拉，幻想成为现实了。人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你说你多理性，如果你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恶梦，第二天一定心情不好，而且心情不好就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影响你待人处世。个人是这样，人群是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也是这样。

这里的问题是当一个英国人想在这个地球上虚构一个乐园，你为什么不放在欧洲，为什么不放在非洲南部，为什么不放在美洲，你怎么想起来放在中国了呢？因为在当时西方人的期望中，中国才是一个理想的圣洁之地。你注意到，他们当时对中国的好印象都来自于对中国的乡村田园、牧歌田园的期望。

1927年，有一个德国旅行家，其实他是个爱桑尼亚人，叫凯泽林，是个伯爵，当时在德国非常有名，做环球旅行，他来到中国，按他自己的说法，第一站到的是广州，他自己说他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他说广州根本不像中国，因为他一上岸就看到一些中国年轻人都穿着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步枪在操练，他说这哪是中国，这完全像西方。因为他正赶上北伐，然后从广州就去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发现还是不像中国，因为有洋人、洋楼，有现代经济，他觉得不像中国。然后他继续往北方走，大概走到义和团的家乡去了，很高兴，说他终于找到了那个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中国是什么样呢？他自己的描述是在“墓碑与田园之间的国土”。

他理想的那个中国是什么样？他说，首先土地是黄色的，人也是黄色的，浑然一体。房屋是一个土包，坟墓是另一个土包，人活着的时候住在这个土包里，死了以后住在那个土包里面，好像没什么差别。在从这个土包进入那个土包的时间里，他耕种土地，种植庄稼，然后把这些粮食、蔬菜吃了，吃了以后排出粪便，然后施肥到土地里面，再长出粮食和蔬菜。按他自己的说法，这叫生态的、环保的，这才是人类的理想生活。我们就感觉不舒服了，其实洋人说我们好，我们也别高兴，因为说好也不一定是真好，你就愿意住在这个土包里面或者那个土包里面吗？你就愿意这一生就跟黄土浑然一体吗？洋人就

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中国人就应该这样。

我们中国当然也有很聪明的人知道洋人是怎么想的,比如说张艺谋,九十年代我们批张艺谋,说这家伙是卖国贼,他老暴露中国的丑恶,说你为什么拍电影不拍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你一拍就是黄土高原,然后人都穿着那种走不动路的大棉裤。张艺谋实际上最明白,他要拍北京、上海、广州就获不了奖,因为那跟洋人对中国的想象不一样,他一拍那种 Natural Cycle(自然循环)的中国,洋人就把奖给他了。所以张艺谋获了好多奖,因为他知道洋人想象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洋人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别扭,但是总归还是说我们好,二十年代后期就开始说我们好,一直好到四十年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二十年代开始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变了,难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中国没发生什么,反倒更糟,是西方自己发生了什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 1815 年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方人有一百年的和平,而且这个时候是西方人在历史上最自信的时候,他们认为西方是最文明的、最理性的、最进步的、最自由的、最民主的,总之西方是人类的精华所在,是这个地球的乐园。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他们打糊涂了,或者说打明白了,他们说我们这个最理性的民族怎么突然最疯狂了,杀人不眨眼,几年之间 1 500 万人就给打没了;说我们本来最和平的、最讲进步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战争暴徒了呢?说我们一直认为西方文明很先进,可是西方文明最先进的那一部分都是用来做武器的,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最尖端的科技是做杀人武器的。他们开始反思这些问题,他们弄明白一点,说你不要看那些整天像睡不醒似的印度人、中国人,说他们才是真正有智慧的,说我们西方人应该向他们学习。在这种思潮下,也就是在西方衰落,东方启蒙的这种思潮下,中国的形象开始变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西方那些最聪明的人都赞美中国,有条件的都要到中国来看看,呆一两年。